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知

——以《人民日报》（1949—1972）涉澳报道为视角

喻伟

【摘要】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果断地选择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澳大利亚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与新中国长期处于隔离、敌对状态。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认知和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冷战色彩。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两国均调整外交战略，逐渐走向接触，并于 1972 年 12 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国的角度，借助于《人民日报》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72 年 12 月之间涉澳报道，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知变化和 policy 调整，这有利于中澳在今后交往过程中减少错误认知，促进两国关系朝着更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到 1972 年 12 月，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经历了由隔离、敌对、对抗，再到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这一转变深受国际格局、美国因素、国内政治、领导人个人因素以及相互认知的影响。然而关于中澳关系变化中的认知因素，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较少，因而探索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知问题，对于现阶段制定对澳政策，减少认知偏见，促进双方关系向更高、更友好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睦邻政策的实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至建交前中澳关系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澳 1972 年建交，这二十三年之间，中澳关系从逐渐的走向敌视和对抗，到最后的缓和与建交。笔者将这一时期中澳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简单的阐述。

（一）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50 初中澳未能建交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澳大利亚奇夫利工党政府外长伊瓦特认识到新中国将在经济上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因此其在联邦会议的一次会谈中提到：“澳大利亚政府应当尽快的采取行动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上的关系。”^①1949 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以后，澳大利亚大使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并表示愿意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然而，在公开的声明上，以奇夫利为首的工党政

^① E.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Carlton,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4.

府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还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从当时的情况看，尽管工党政府有承认新中国的意愿，但是事实上，考虑到国际和国内的因素，当时的工党政府并没有真正的魄力去承认新中国。首先，二战之后，澳大利亚在安全上更依赖美国，工党政府倾向于赞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在另一方面，竞选临近，反对党自由-乡村党声称，执政的工党政府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对象，工党政府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时需要采取谨慎的立场。

随后，工党政府在澳联邦选举中败北，以孟席斯为首的原反对党自由-乡村党上台执政。面对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孟席斯政府也进行了各种考量。1949年12月20日，在给外长斯彭德的函件中，澳大利亚政府对于承认新中国的利弊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和衡量。不应该过早承认新中国的主要理由在于：（1）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承认新中国会助长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的气焰；（3）没必要违背美国的意愿。而认为应该尽快承认新中国的理由包括：（1）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中国的大片领土；（2）中国是否已经和苏联捆绑在一起，这还不明确。^①然而，在冷战的环境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国家的安全利益始终是澳大利亚考虑的首要因素，所以澳大利亚会坚定地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边，这符合其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从中国的角度看，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采取了不急于要求其承认的方针。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②对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周边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则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③

（二）20世纪50和60年代中澳相互敌视局面的形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澳政府看来，朝鲜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有限的武装冲突，而是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有计划、有预谋的一部分，而中国是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幕后主使者。6月29日，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军分舰队便由美国指挥使用，随后澳大利亚的军队和物资不断地运往朝鲜半岛。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战，中澳在朝鲜半岛上开始兵戎相见。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中国是在向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并积极输出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中国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侵略者的坚定同盟，是反华的认知形成。

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趋向于强硬。一方面，为遏制国内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澳政府积极地推行反共政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更加关心的是通过越南战争来限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向东南亚地区的扩散。1965年4月，澳大利亚决定派兵进入越南。孟席斯总理认为：“控制南越，是中国共产党进攻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一步。越南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图谋，越南不过是中国手中的一颗棋子。”^④因此，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派兵参与越南战争进行谴责。

^① Submission to Spender, Canberra, 20 December 1949, *Australia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2*, p. 5.

^②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④ 李海琼：《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与承认问题（1970—1972）》，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澳大利亚选择站在苏联的一边,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支持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尤其是在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之后,澳大利亚竟指责中国攻击苏联。

中澳关系相互敌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问题。20世纪50年代,面对剑拔弩张的海峡形势,澳大利亚害怕卷入中美之间的冲突,因此在对台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孟席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曾声明,《澳新美条约》的义务不适用于台湾。而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霍尔特的执政,澳大利亚向台湾派驻“大使”。1967年,澳总理霍尔特访问台湾,引起了中国政府极大的愤怒。

(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澳关系走向缓和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而美国多年深陷越南战争,急需摆脱困境。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及正常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澳大利亚考虑到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会使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扩大,亚洲国家会加速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因此,“澳大利亚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重新评析对华政策,更应该在澳大利亚及睦邻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政策,这样才能在美国改变对中国及印度支那的政策时迅速做出反应。”^①作为英联邦国家之一的加拿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促使澳大利亚重新思考对华政策。同时,1970年10月,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的小麦贸易协议期即将到期,但是中国却没有续签的意愿。由于当时英国即将加入欧共体,美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到欧美变得极为困难。如果中国拒绝与澳大利亚进行小麦贸易,这将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因此,澳大利亚国内的“小麦集团”积极要求澳政府改善对华的关系。

随着中澳民间交往的增多,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民间要求改善澳中关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澳大利亚国内的公众、学术界和政治团体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好转,要求改善对华关系。”^②1971年7月,工党领袖惠特拉姆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惠特拉姆并就影响中澳关系的问题双方交换了意见。惠特拉姆承诺,“如果工党赢得大选,他将是第一位访华的的澳大利亚总理……并称这次访华是令人兴奋的。”^③1972年12月初,工党在澳大利亚大选中获胜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澳顺利实现建交。

二、《人民日报》(1949-1972)涉澳报道定量和定性分析

本章主要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于《人民日报》涉澳报道的主要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通过涉澳报道的文章篇数的“量”得出中国政府对澳关注的焦点,而通过对其主题性质认识而得出其认知的态度。

(一)《人民日报》(1949-1972)涉及澳大利亚报道的定量分析

本文采集《人民日报》涉澳报道的文章主要依托《人民日报》电子版数据库。采用标题关键词和正文关键词(澳和澳大利亚)相结合的方法检索所要分析的文章样本,然后进行人工筛选。从1949年10月至1972年12月,共计样本文章990篇。(见表1)

^① Policy Planning Paper, Canberra, 21, July 1971, *Australia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2*, pp. 524, 525.

^② 张秋生:《试论澳中建交及其对澳关系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69-79页。

^③ Edward 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 Australia: Viking, 1985, p. 53.

T/N/C	澳 共 产 党	内 政 外 交	民间 交往	人民 群众	工 人 运 动	和 平 运 动	工 会	经 济 类	工 党	其 它	合 计
1949 (10-1 2月)	9	7	0	1	1	3	2	0	0	0	23
1950	5	23	0	9	6	8	5	0	0	1	57
1951	6	10	0	6	3	6	2	0	2	5	40
1952	5	5	2	2	1	25	5	2	0	0	47
1953	2	7	1	2	0	6	3	0	0	0	21
1954	3	10	2	5	1	1	0	1	1	0	24
1955	3	5	1	2	1	4	4	0	0	0	20
1956	1	15	22	2	0	0	1	5	3	2	51
1957	2	5	9	1	0	6	5	1	7	3	39
1958	8	6	2	1	0	2	2	2	1	2	26
1959	11	3	2	2	2	0	1	2	0	1	24
1960	10	1	3	0	7	5	11	1	0	0	38
1961	18	8	9	2	2	0	5	7	0	1	52
1962	4	14	5	1	3	6	1	2	0	0	36
1963	7	3	6	0	1	0	2	0	0	0	19
1964	30	3	15	2	3	0	10	0	0	0	63
1965	30	18	11	5	2	3	3	0	0	2	74
1966	28	13	9	9	0	2	2	0	0	0	63
1967	16	5	2	10	2	0	0	0	0	0	35
1968	4	4	1	8	7	0	0	0	0	0	24
1969	22	2	1	22	23	0	0	0	0	0	70

1970	17	0	0	9	9	0	0	0	0	0	35
1971	18	1	18	2	7	0	0	0	5	0	51
1972	3	10	27	9	6	0	2	0	1	0	58
合计	262	178	148	112	87	77	66	23	20	17	990

表 1:《人民日报》(1949-1972)涉澳报道定量分析统计表

(注: T-时间 N-数量 C-内容)

从以上的统计表格可以看出,有关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相关题材的报道文章,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拥护,反对澳政府对共产党的迫害,抗议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号召民众起来斗争以及澳共与中国政府的交流等文章所占的篇幅最多,达到 262 篇,占总报道的 26.5%,涉澳共报道数量及变化曲线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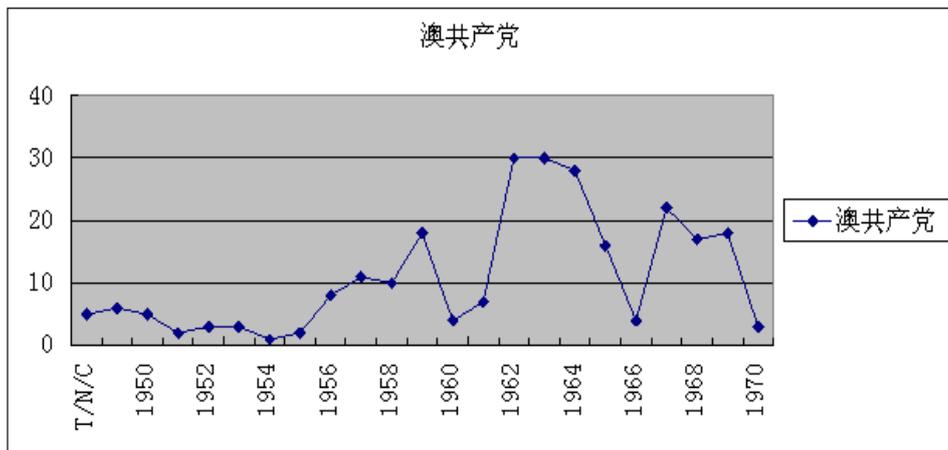


图 1:《人民日报》(1949-1972)涉澳共产党报道数量及变化曲线图

有关澳政府内政和外交报道的文章,主要包括澳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上的政策以及澳实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在国内政策上对澳共的政策有 178 篇,占总报道的 17.98%。涉澳内政外交报道数量及变化曲线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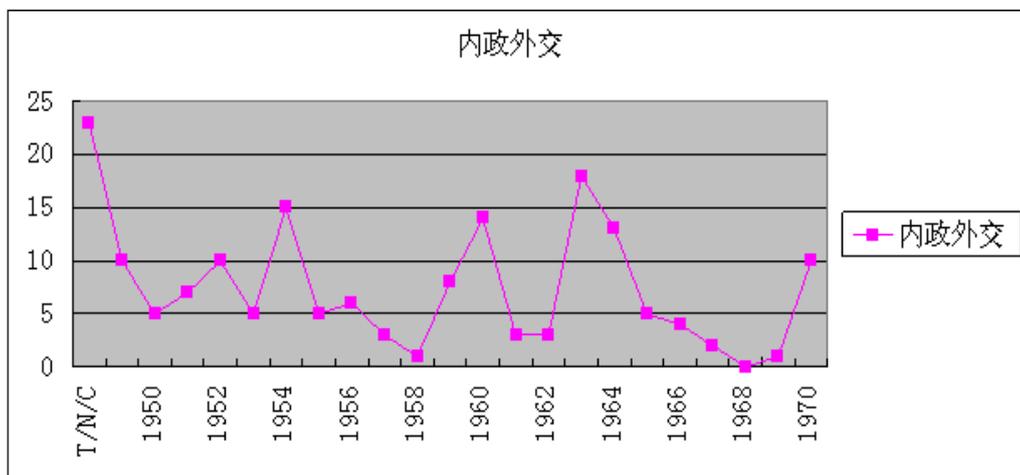


图 2: 《人民日报》(1949-1972) 涉澳内政外交报道数量及变化曲线图

有关中澳民间交流(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之间的交流)(见图 3)、澳大利亚人民群众运动(民众抗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进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进行核试验等)、工人运动(工人罢工以及工人抗议政府、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议题分别占总报道的 14.95%、11.3%、8.8%,同时,有关澳大利亚和平运动也达到 77 篇,尤其是在 1950、1951、1952、1953 年达到报道数量的顶峰。澳大利亚工会以及与中国工会的关系也一直是报道的重点达到 66 篇。而在这段时间内,尽管工党一直处于在野党,但是中国对于工党的政策一直保持关注。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注的相对较少,总共涉及报道只有 23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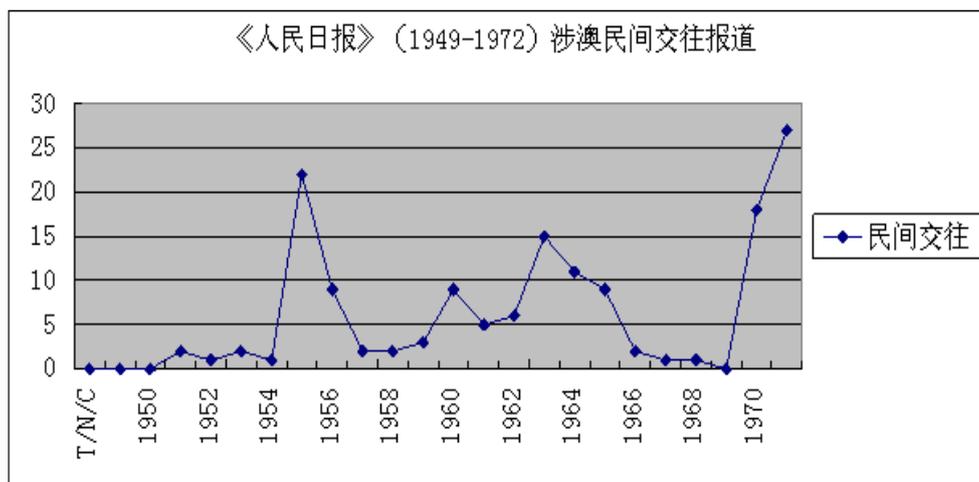


图 3: 《人民日报》(1949-1972) 涉民间交往报道数量及变化曲线图

以上内容主要是笔者从报道的数量和主要的议题的角度对《人民日报》从新中国成立至中澳建交这段时期内涉澳报道的简要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认知的关注点。

(二) 《人民日报》(1949-1972) 涉及澳大利亚报道定性分析

通过对《人民日报》涉澳报道主要议题的分析,笔者把涉澳报道的 990 篇文章从性质上进行归类:积极肯定、消极否定、中性客观三种。性质分类的标准以新闻的内容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为标准,即如果中国的读者通过这篇报道能够形成或者增强对所报道内容的正面认知,那么这篇报道就属于积极肯定类;反之,如果中国的读者通过该篇报道可能形成或强化对该议题的负面态度,那么这篇报道就属于消极否定类;如果该篇报道只起到为读者传递信息的作用,并使得读者对于所报道的内容没有明显的积极或者负面的认知,那么这篇报道就属于客观中性类的报道。

根据以上的标准,笔者对收集的 990 篇涉澳报道的文章进行了重新的统计分析。(见表 2)

主题 - 篇 数 性质	澳 共	内政 外交	民间 交往	人民 群众	工人 运动	和平 运动	工 党	经 济 类	工 会	其 它	合 计
积极 类	20 5	20	86	78	87	77	20	0	43	0	61 6
客观 类	53	19	62	34	0	0	0	16	23	17	22 4
消极 类	4	139	0	0	0	0	0	7	0	0	15 0
总 计	26 2	178	148	112	87	77	20	23	66	17	99 0

表 2:《人民日报》(1949-1972) 涉澳报道定性分析统计表

从以上的数据表当中可以看出,在有关澳共产党方面的报道当中,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报道和中性的报道,而消极的报道只占了4篇,主要是在中共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之后,澳共采取了支持苏共产党的决定,《人民日报》对于澳共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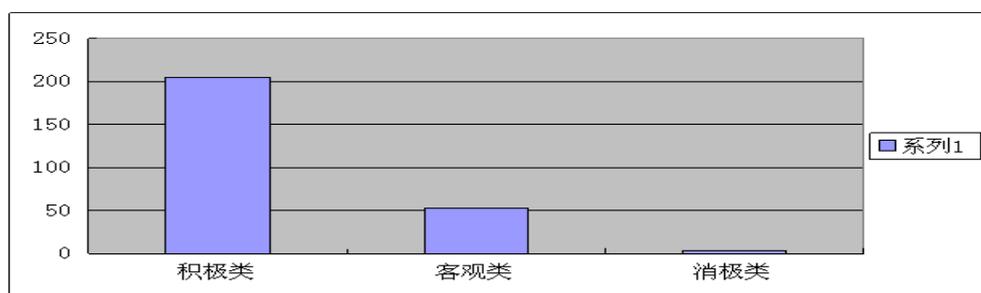


图 4:《人民日报》(1949-1972) 涉澳大利亚共产党报道定性分析

在涉及澳大利亚内政外交的报道当中,负面报道占据该议题报道的78.1%,正面的报道仅占11.2%,中性的报道占10.7%,所以在这期间,对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整体上呈现一种否定的态度,这体现了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一种认知态度(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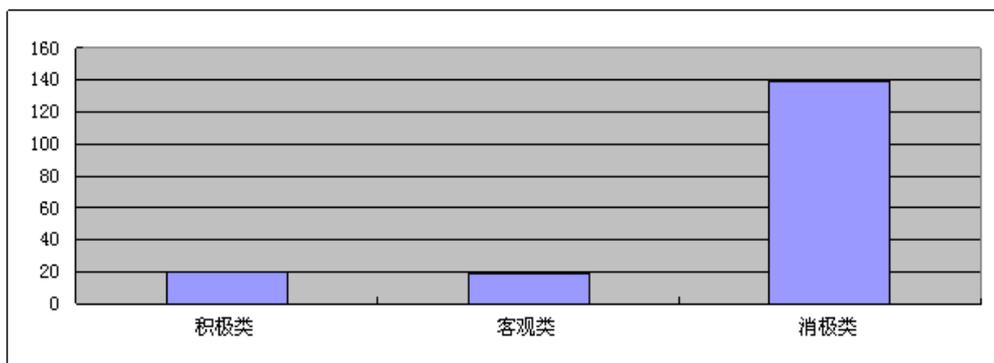


图 5:《人民日报》(1949-1972) 涉澳大利亚政府报道定性分析

在经济方面的报道当中，如上所述，文章数量偏少，仅为 23 篇。而在认知态度上，负面的报道占据 7 篇，中性的报道则为 16 篇，而正面的报道则为零篇。

有关工党的报道当中，文章的篇数总共为 20 篇。然而，所有的文章都是肯定工党的政策，这也说明了尽管这段时间工党一直处于在野党，但是中国却对其政策和声明进行了关注，并对其政策表示认可。也正是因为这种一直以来对工党的这种认知特点，使得中澳在澳工党上台之后，能够迅速地建立外交关系。

涉及中澳民间交往（包括文化、艺术、科技、青年等）的相关报道当中，正面报道的文章有 86 篇，占 58.1%，中性的报道 62 篇，占 41.9%，负面的报道为零。这体现出中国对于中澳民间的往来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关于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包括工人罢工以及工人抗议政府、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等方面，《人民日报》倾向于支持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对其采取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同时，涉澳大利亚和平运动的文章一共有 77 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澳大利亚和平人士积极的拥护世界的和平运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抗议各国进行核试验，报道都呈现一种正面的认知。有关澳大利亚工会的报道，包括澳大利亚工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双方之间的互访和交流，都是一种积极肯定的认知。

尽管从整体上来讲，1949 年至 1972 年《人民日报》涉澳大利亚报道以积极类为主（616 篇，占总报道数的 62%）（见图 6）。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部分即积极类的报道当中，都是关于澳共、人民群众运动、工人运动、民间交往等的报道，而关于澳消极的报道一共只有 150 篇。而对于澳政府进行批判的文章就有 139 篇，占 93%。其主要体现的还是中国政府对于澳政府的消极认知，将澳政府和澳人民区别对待，同时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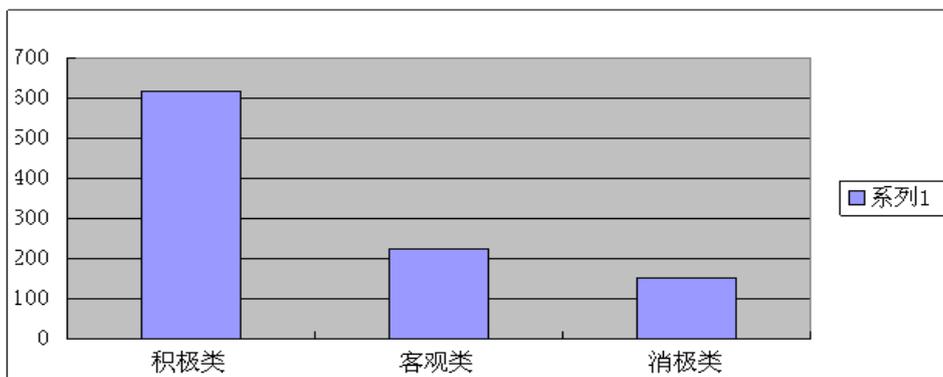


图 6:《人民日报》(1949-1972)涉澳报道定性分析表

总之,通过分析,我们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澳建交这段时间内,有关澳共、澳内政外交、澳人民群众运动以及中澳民间交往是《人民日报》报道的焦点所在,分别占报道总数的 26.5%、17.98%、11.3%、14.95%。透过定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认知上,呈现三个层面的特征,一是政府层面,消极认知为主导,这直接导致中澳关系的持续恶化;二是民间交往比较多,有利于增进双方的认识;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体现较为明显。

三、建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认知变化的理论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国际社会的认知受到两种观念的制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因此在对外关系上,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百年的屈辱史以及文化的积淀使得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对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平等较为敏感,因此,在界定西方国家形象时,民族主义色彩明显。

(一) 中国对澳大利亚认知特点及主要表现

根据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理论,影响决策者对另一个国家的认知的主要因素有:认知相符理论、统一性知觉、历史包袱、诱发定势。我们将结合《人民日报》涉澳报道所承载的中国对澳大利亚认知,一一对应进行分析。

1、认知相符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

在事先预期的情况下,决策者会选择收集那些与事先假设一致的信息,即按照之前对于一个国家的印象来预期其行为、解读其政策。这样的认知往往会致错误的知觉,夸大对方国的敌对行为。在中澳建交之前,这一时期报道的议题很大一部分集中于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判。主要原因是基于澳大利亚政府追随美国,在国际上与美国一致,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判断之上。所以,澳大利亚被中国解读为“美帝”支持下的“反华反共的包围圈”,推断澳大利亚也是敌视中国政府的。长久以来,这种知觉植根于中国执政者的头脑中。根据认知一致性的理论,行为者通过调整或过滤对外部信息的接受与解释来维持原有的认知,如果在行为者的印象中,对手是敌意的,那么当对手释放善意的信号时,为了保持原有的认知,行为者往往调整其对信息的解读,认为对手的善意信号只是一种欺骗手段而已。从 1950 年底到 1951 年,《人民日报》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判达到 11 篇,称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走卒、走狗,是美国的仆从国和侵略的帮凶。并刊载了一篇长达四千多字的文章《美帝国主义的走卒——澳大利亚》,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角度,阐述澳大利亚与美国相互的勾结。从这些《人民日报》涉及澳大利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出兵朝鲜是激烈批判的、是敌视的。说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的了解并不深刻,特别是将澳美同盟关系看成是铁板一块。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识,首先是建立在对澳美同盟的一致性的判断认知基础之上的。

鉴于澳大利亚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参加对越南的战争。与此同时,与台湾关系“升级”,澳外长和总理相继访台。中国对澳大利

亚的敌视一步步的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用一些言辞尖锐的词语对澳大利亚进行强烈的批判和讽刺如将澳大利亚形容成“帮凶”、“美帝国主义忠实奴仆”、“炮灰”、“壮丁贩子”、“殉葬品”。在60年代末,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美之间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中国对澳政府的认知开始有所缓和,中国对澳政府的认知逐渐趋于理性。表现在《人民日报》在60年代后期对澳大利亚的批评逐渐减少。

2、统一性知觉与中国对澳政府的认知

在认知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将其他人的行为看成是统一的、有计划的。“在国际关系中,决策者一般会过高地估计对方对于权力掌握的程度以及国内的统一协调性,而不是将对方看成是各个行为体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各自对国家利益偏颇狭隘的理解而各自采取的行动。”^①这种错误的知觉部分地造成了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认知。中国认为澳政府尤其是孟席斯政府是彻彻底底的美国追随者,奉行对中国的敌视政策,为美国的侵略战争服务。正如《人民日报》相关评论文章指出的那样,“孟席斯任职十六年中,在国内、外政策上一贯追随美国,为华尔街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②而在孟席斯政府的内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凯西外长是一个谨慎的行动者,他不“敌视中国”,在其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行政管理也得到大大的改善。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从19世纪的羞辱中的到了恢复。”^③而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这种认知,主要的基于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期,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首先是行政机构各级相关机构反映情况,然后逐级上报,引起最高决策层分管首长重视,再提供给最高决策层讨论,得出决策意见后,一般按照上传或者需要承担落实任务的渠道下达贯彻,形成了相对单一的上下串联的决策方式。”^④尽管对于任何外交政策可以进行讨论,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归毛泽东主席个人。因而,出台一项外交政策,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决策层意见统一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政府认为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也是其政府内部协调一致的结果,忽视其内部关于对于是否参加朝鲜战争以及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

3、“历史包袱”对于中国对澳大利亚认知上的影响。

在国家关系史的学习过程中,人们会简单地将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现实当中的事实进行类比,将一些本质上不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认知的错误。^⑤陶文钊先生曾评价过:“在中国方面,由于我们有长达一个世纪受列强侵略、压迫、剥削和欺负的历史,所以我们对外国对它国内事务的干预特别敏感,而且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个世纪的受气史、屈辱史。”^⑥这样的历史经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独立的主权以及反对殖民主义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政策所积极追求的,我们也能够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② 《澳总理孟席斯辞职》,《人民日报》1966年1月25日,第3版。

^③ Millar, Casey Dairy for 3 Aug. 27 Oct 1951, 27 Mar. 1952.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2*, p. 53.

^④ 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⑤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24页。

^⑥ 转引自钱皓:《龙文化、大国心态、中美关系——对中国“受害者心理”的历史与理论考释》,《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看出新中国的外交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当澳大利亚跟随美国派兵进入朝鲜，越南，以及美澳新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中国共产党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于自身主权和独立的一种威胁，所以对于澳大利亚的外交行为，中国政府倾向于认定这是一种敌视、对抗。

4、诱发定势对中澳关系的影响

人们在接收新信息的时候，往往以自身当时聚焦的问题为定势，以此来解读自己获得的信息。在国际政治中，受到诱发定式的影响，决策者会容易以自己关注点为中心，并且认为对方国家也同样会围绕自己关注点制定政策。^①

诱发定式在中国政府关于向澳大利亚进行革命外交的认知和意识形态认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推行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的革命外交，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战线，积极地拉拢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而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涉澳报道大多就是以以上的方式实践和建构的：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并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来对澳大利亚进行认知，支持与中共具有共同基础的澳共以及澳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而把澳政府看作是民众与工人阶级对立的一方，并将其称之为反动的政府，积极地发展与澳共的关系。

革命外交认知以及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认知模式的形成与中共早期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政府本身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罗伯特·杰维斯谈到国家在对所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时，会受到当前所关注的信息的影响。“一个行为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害怕什么、已经做过什么事情，这就确定了他的知觉框架。”^②

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当中取得政权的，而且深受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共领导人早期的经历和处境的影响。这种阶级的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当中。1944年8月，中共发表首个《外交工作指示》，文中提到：“外交工作的开始，就是指在国际间统一展现的开展，故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也适用于国际统战。”^③透过这些论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中共的认知维度里，所谓“外交”，不过是国内阶级斗争思想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一种延伸。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强的革命色彩，以至于我们对于别国的认知也基于一种革命色彩的基调。同时，从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这也是由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所导致的。

这种注重意识形态的认知方式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而当时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只片面注重意识形态的认知和政策，导致中国在6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状态，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二）中国对澳大利亚认知的转变及中澳建交的实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新中国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1968年初，周恩来提出要整顿外交纪律，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①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216页。

^②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修复、发展和已建交的国家的关系，争取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①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涉澳报道的主要议题中，有关澳共和批判澳政府内政外交的文章急剧减少，关于中澳民间交往的报道却达到最高峰，尤其是以报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的报道为主（见下图 7），达到 10 篇。在 1972 年 9 月 7 日一篇《中澳人民友谊深——记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的评论文章对于中澳乒乓球代表团的交流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该文用三个章节对于这次活动进行了概述，分别是“乒乓球促和平”、“友谊花盛开”、“你们是在朋友中间”，^②这一次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澳，传递出了中国政府“小球”传友谊的信号。除了关于体育方面的报道，从 1971 年到 1972 年，《人民日报》关于中澳交往的报道还涉及教育、医疗、科技、工会、学生团体等几乎涵盖所有民间交往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认知的一种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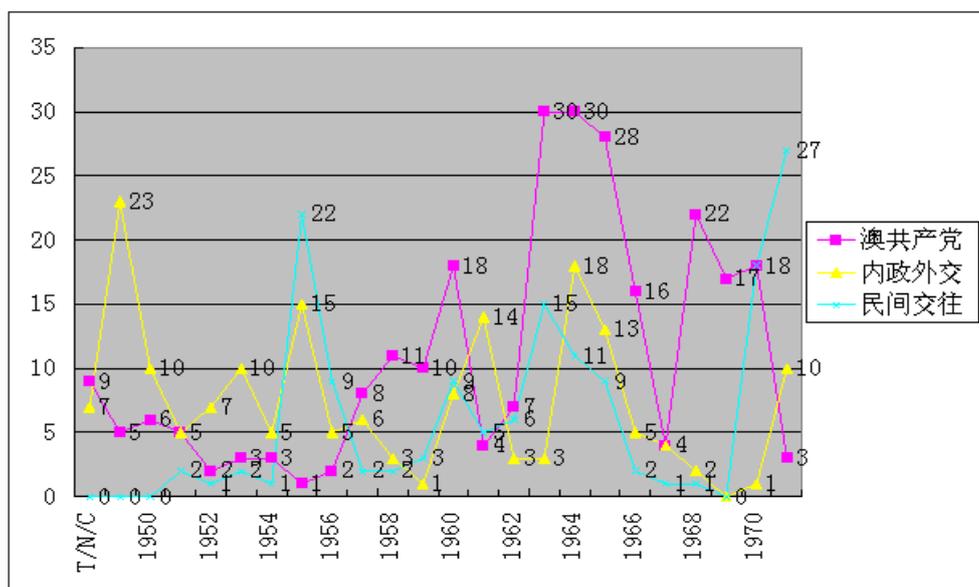


图 7:《人民日报》(1949-1972) 涉澳报道主要议题图表

在政府层面，在惠特拉姆访华之后，为了打破中澳之间关系的僵局，改善中澳之间以往低层次的接触，中国政府通过墨尔本商人詹姆斯·基布尔主动邀请澳陆军部长安德鲁·皮科克来中国作私人访问。这充分的显示了中国政府想尽快与澳大利亚改善关系的愿望。而麦克马洪政府担心这样会对大选不利，却希望派一个由商人和政府官员组成的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其目的是使中澳之间的交往性质停留在贸易层次上。之后，在 10 月份，中方重申了对皮科克的邀请，不同意澳贸易代表团访华。从中国期望改善中澳对话层次的要求中，也能看到中国对于澳大利亚认知和政策的改变，希望改善中澳之间的关系。

而在 70 年代初，中澳能够迅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还离不开澳工党长期以来对华采取积极的态度。从 1949 年底下台到中澳建交前，工党一直以一种积极的姿态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承认新中国一直是工党对华政策的重要一部分。1955 年在霍巴特年会上，澳工党便做出了承认共产党新中国的决议，并把这一决定写进党章。

^① 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年 5 月，第 173 页。

^② 《中澳人民友谊深——记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人民日报》1972 年 9 月 7 日，第 1 版。

从 60 年代末期开始，惠特拉姆积极地推动承认中国作为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和其它利益的一个有效步骤。1971 年 7 月 5 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以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惠特拉姆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不持两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承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应该与中国人自己解决，表示如果工党执政，将会很快承认中国。1972 年 12 月，工党击败自由党上台执政，澳总理随即启动关于中澳相互承认和建交的谈判。并于同年 12 月 21 日双方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并决定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前从台湾撤走其官方代表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欣赏。”^①中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四、结论

在冷战的背景下，新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中苏、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主要着力点。而作为远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并不是新中国关注的焦点。尽管《人民日报》涉澳报道比较多，但是在中国政府眼中澳大利亚始终只是美国的附庸，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知是伴随着对美国的认知而产生和变化的。所以在中国的认知维度里，仅看到澳大利亚跟随美国的一方面，而忽略其在外交上追求独立自主的一面。比如在对华进行物资禁运的问题上，澳大利亚虽赞同美国对华进行战略物资的禁运，但是却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执行美国的标准，在非战略性物资上，澳大利亚主张同中国进行贸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澳大利亚与美国政策的趋同，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跟随美国，而是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利益的趋同。”^②同时，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恐惧是长期以来历史文化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合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结果，而并不仅仅因为澳依赖美国。可见，中国政府在对澳大利亚的认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知觉错误。

伴随着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中澳进行外交调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知产生变化，经过双边的努力，双方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对于中国拓展外交空间，维护国家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澳大利亚，中澳关系的正常化也有利于澳外交上的独立和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国与国之间的良性发展，应该要抛弃传统的认知偏见，超越意识形态，在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

^① 《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12 月 23 日，第 1 版。

^② 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p. 25.